

文摘

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姚永铭* 执笔

2003年12月26日至30日,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共有6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学者15人。会议共收到论文59篇,会议论文集即将结集出版。

会议的主要议程如下:

12月26日代表报到。

12月27日上午8:30至9:15举行开幕式,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一室副主任吴福祥研究员共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一室主任曹广顺研究员分别讲话,介绍会议的缘起、目的以及筹备过程等。

* 姚永铭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mail: ymyao38@sohu.com

论文报告会共分 8 场(包括青年论坛 2 场)。

第 1 场(27 日 9: 30—11: 45)由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吴金华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共同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蒋绍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沈家煊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冯胜利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魏培泉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研究员、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李宗江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祝鸿熹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也谈能性述补结构“V 得 C”和“V 不得 C”的不对称》、《论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中古汉语使成式中心语辨识法之探讨》、《从“已讫”说起》、《21 世纪汉语史学者的学术追求》、《辞书与汉语史》。

第 2 场(27 日 13: 30—15: 0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魏培泉研究员共同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张敏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姚振武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洪波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从所谓“补语”问题谈古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参照系》、《历时类型学与汉语历史语法的新课题》、《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检讨与反思》、《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点思考》、《唐宋时期“取”的两种虚词用法的再探讨》。

第 3 场(27 日 15: 15—17: 15)由美国哈佛大学冯胜利副教授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岛谦一教授共同主持,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吴金华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张涌泉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遇笑容副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俞忠鑫教授、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徐丹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界面来看汉语句子融合和动词虚化》、《文献整理与汉语史研究》、《试用字形分析的方法判别敦煌卷子的真伪》、《梵汉对勘与佛经语法史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声调标记法小议》、《上古汉语后期否定词“无”代替“亡”》。

第 4 场(28 日 8: 30—10: 00)由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和北京大学朱庆之教授共同

主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岛谦一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日本熊本学园大学外国语部丁锋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张洪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麦耘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由“日/时”自商至周之古文字结构分析其字形所代表的词语》、《〈事林广记〉“辨字差殊”条试释》、《日汉对音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及其思考》、《永明声律说的语言学考察》、《历史音韵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

第5场(28日10:15—11:45)由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麦耘教授共同主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孙景涛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陈忠敏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刘镇发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徐时仪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朱庆之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形态构词与古音研究》、《实验语音学与历时音变——用共时来诠释历时》、《〈切韵〉的音值再探》、《作品断代和语料鉴别》、《略论文献异文考证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作用》、《语言接触：汉语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6场(28日13:00—14:30)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张敏副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教授共同主持，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杭州师范学院汪少华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张生汉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汪维辉教授先后发言。题目包括《企足以望二史》、《汉语连接副词“就”的语法化》、《词语札记三则——兼谈词语构成类型的分析》、《“鞞”“纷”考》、《乾嘉之学与汉语史研究》、《再论〈集韵〉的洪细》、《〈老乞大〉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

青年论坛分2场。

第1场(27日19:00—20:15)由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徐丹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张洪明副教授共同主持，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博士、池昌海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董秀芳博士、胡敕瑞博士、刘子瑜博士、浙江温州师范学院王莉、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荒见泰史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梁银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祖生利博士先后发言，题目包括《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史

研究》、《〈史记〉中助动词“可”和“可以”的语法功能差异描写》、《认知、语用与语义演变模式》、《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汉语选择问句历史发展研究述评》、《试论殿句语气词“着”的语法化》、《从敦煌写本中变文的改写情况来探讨五代讲唱文学的演变》、《汉语趋向补语的产生机制和动因》、《元代直译体文献中“一般”和“也者”的特殊用法》。

第2场(27日20:30—22:0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姚振武研究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共同主持,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龙国富博士、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史光辉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唐贤清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郑贤章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杨荣祥博士、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姚永铭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张颀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赵长才博士等先后发言。题目包括《〈妙法莲华经〉中的“V(O)已,VP”格式》、《从语言角度判定〈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从副词“尽行”看汉语语法化的句法制约性》、《〈龙龕手鏡〉与大型字典的完善》、《论上古汉语的连动共宾结构》、《应该大力提倡字音史的研究》、《〈论语〉〈孟子〉受事主语句考察》、《〈庄子〉的程度副词系统》。

28日15:00开始大会自由发言,由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共同主持。麦耘、朱庆之、洪波、张洪明、鲁国尧、曹广顺、张敏、史光辉、祝鸿熹、平田昌司、徐丹、遇笑容、方一新等先生先后畅谈与会感想与收获。

最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作大会总结。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老一辈的著名语言学家,更有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外汉语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许多人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如鲁国尧先生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擅长方言、音韵及文史语言学研究,代表作有《鲁国尧自选集》、《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沈家煊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之一,《国际话语研究》杂志 Discourse Studies 名誉编委,擅长英汉比较语法、语法理论、汉语功能—认知语法、口误的心理语言学

研究等，代表作有《不对称和标记论》；蒋绍愚先生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代表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等；孙朝奋先生曾获美国俄勒冈大学语言学硕士、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中文部主任兼系主任，擅长研究句法的演变、语法化、语义演变以及话语分析等，著有 PROCEEDINGS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1 AND 2、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YNTAX、WORD ORDER CHANG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平田昌司先生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是目前日本汉学界颇有声望的著名汉学家，在汉语史及汉语方言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此外还有一批崭露头角、活跃在国际汉语学界的青年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副教授冯胜利博士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各大学联合汉语中心主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东亚系中国语言学副教授张洪明博士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执行秘书长；魏培泉先生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擅长汉语历史语法、汉魏六朝语法史、先秦及汉魏六朝断代语法研究。

本次会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十分浓郁的理论色彩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汉语史研究的发展与展望，因此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务虚的会议，其主旨是要从宏观上把握汉语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为新世纪的汉语史研究发展走向“把脉”。参加本次会议的一些学者有的本来就是从事理论研究的，有的长期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对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有“零距离接触”，国内的有些学者利用自身较高的外语水平，通过互联网自觉跟踪世界语言学的最新动向，他们将这些最新的理论和动向介绍给与会学者，使得这次会议理论色彩特别浓郁，这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历次举办的各类会议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可喜的是，理论的介绍已不停留在纯粹的知识、理念的阶段，而是自觉利用这些理论来进行汉语史研究的实践。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题目来看，很多是具体语

言现象的研究，但是其中往往运用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似乎也预示着新世纪汉语史研究发展的新方向。理论意识的加强，昭示着汉语史研究的路子将会越走越宽。

二、非常扎实的材料功夫

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汉语史研究在材料方面向来也有优良的传统，在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倡导下，学者们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的发掘，在材料上舍得花大力气。正如与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注重材料，生搬硬套，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次会议的论文，无论是微观的研究还是宏观的探讨，都非常重视材料的分析甄别，不作凿空之论。

三、坦诚宽松的学术氛围

一个学科的繁荣发展，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友好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大家普遍感到，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从一字一词、一笔一画的精细考证，到宏观的道理、研究方法，大家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王云路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内容上兼备，态度上兼容，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兼容并包。大家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没有意气之争，有的只是心平气和的纯学术的讨论。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有利于促进汉语史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四、相对集中的研究热点

这次会议内容丰富，涉及到汉语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来说，语音、词汇、语法都在研讨之列。

从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来看，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在提交大会的近60篇论文中，有20余篇论文涉及汉语语法史，占总数的1/3强。这些论文既有宏观的探讨（如吴福祥先生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检讨与反思》、张敏先生的《历

时类型学与汉语历史语法的新课题》等），又有微观的研究（如曹广顺先生的《从“已讫”说起》、洪波先生的《唐宋时期“取”的两种虚词用法的再探讨》等），它们或者视野开阔，纵横捭阖，或者目光如炬，细致入微，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语言材料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汉语史研究的初期，学者们比较注意语言现象的发掘，而对材料本身的考察显然投入得太少。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感觉到语言材料年代的考辨及其真伪的判别，对于语言历史研究十分重要。语言研究如果要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基础上，首先就必须对语言材料下一番考证功夫。方一新先生的《作品断代和语料鉴别》、张涌泉先生的《试用字形分析的方法判别敦煌卷子的真伪》、胡敕瑞先生的《中古汉语语料鉴别述要》、史光辉先生的《从语言角度判定〈佉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非支谶所译》、阚绪良先生的《〈齐民要术〉卷前〈杂说〉非贾氏所作新证》都在考定年代及判别真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

音韵学及语音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但学者们同样注重研究方法，如麦耘先生的《历史音韵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丁锋先生的《日汉对音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及其思考》、孙景涛先生的《形态构词与古音研究》都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汉语音韵研究，陈忠敏先生的《实验语音学与历时音变——用共时来诠释历时》运用最新的音变理论，通过实验手段，尝试用共时音变来诠释历时音变。

由于老一辈著名学者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的倡导和身体力行，浙江大学的汉语史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轻一代的学者如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等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敦煌文献整理、俗字研究等诸多领域承担了不少重点课题，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整体实力不容小觑。浙江大学的汉语史研究确实有着务实的传统，优良的学风，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研究偏重文献的考据，而比较忽视理论的探究，理论素养的欠缺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势必制约中心成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品位，直接影响到汉语史研究的快速、健康发展。有鉴于此，本中心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研究所共同主办此次会议，邀请海内外学有所成、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齐聚美丽的西子湖畔，共商汉语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从学科内部来看，语音、语法的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思维，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相对而言，词汇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性比较难以把握，研究者往往也比较忽视理论，就事论事比较多，而归纳总结比较少。通过这次会议，原先不太关注理论进展的学者对比较流行的理论、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对自身的研究工作无疑会有所裨益。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交流，无疑也会促进整个汉语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视野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以词汇史研究为重点，我们觉得在继续保持这一传统优势的同时，有必要开辟新的战场，比如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方面应该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使得我们的汉语史中心成为国内全面研究汉语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

21世紀漢語史學者的學術追求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李宗江

二十世紀的漢語史研究就其理論和方法說主要是兩個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運用傳統語文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的研究，包括音韻、文字、訓詁等；另一方面是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的研究，包括語法演變、詞彙發展、語音變化（如運用內部擬測法對漢語歷史語音系統的構擬）、方言史等。就理論和方法來說，外國語言理論和方法對漢語史研究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傳統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近年來功能語言學也開始對漢語史研究產生影響，如認知語法、語法化理論等。這是就其要者而言。其實不論境內學者還是境外學者，也不論是老一代還是年輕的一代，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使用本土的理論和方法或完全使用外來的理論和方法的都不多。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兩者的綜合運用：一是主要用現代國外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同時參照中國傳統的理論和方法，比如高本漢關於漢語歷史語音的研究、羅傑瑞關於漢語閩語歷史語音的研究等，我們還沒有發現哪一位學者完全不用漢語音韻學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純粹用現代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任何一個平面的漢語語音系統，且把兩個平面之間的聯繫說清楚。再比如語法史的研究，由於本土原本沒有系統的漢語語法理論，所以使用的理論和方法主要是從國外來的傳統語法的句子結構和詞類理論，但哪本語法史也離不開傳統意義上的虛詞（包括現代意義上的代詞、副詞、甚至是名詞和動詞中的一部分，如時間名詞、方位名詞，能願動詞等）研究的成果。二是主要用傳統語文學的方法，同時也借鑒現代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比如王力的音韻學也運用了現代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張永言、郭紹虞等的訓詁研究也運用了現代語義學的理論和方法等。中外結合，這應該是漢語史研究的方法論原則，魯國堯先生（2

003) 開明宗義地提倡：“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之一是將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結合、融會。”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背景和原則之下，我們覺得 21 世紀的漢語史研究應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所追求，即理論意識、世界眼光和未來指向。

一、理論意識。漢語史的研究可以包括微觀和宏觀兩類。微觀的研究主要是指以字或詞或句式為個案的研究，包括其語音的變化，意義的演變和語法特徵的變化；同時也應該包括對典型語料，如專書、專人作品或某類特定的言語作品（如唐詩）語言特點的研究，包括某個特定範疇演變的研究，如聲母演變的研究，某個詞類演變的研究。宏觀的研究是指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對一個時期或整個漢語在某一方面（比方語音或語法）或全面發展脈絡的勾勒。同時漢語史的研究還可以包括描寫和解釋兩個方面。描寫是對語言事實的梳理和認定，解釋是對此一事實與彼一事實之間或語言演變與相關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繫的說明。但不管是哪一層次的研究，理論的意識和自覺都非常重要。所謂理論是對語言歷時演變發展內部規律的概括和假設，就漢語史的研究來說，我以為理論追求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含義：

1. 傳統理論的總結。這方面做得不夠。我國有豐富的語言歷史研究的成果，雖然並不都屬於現代意義上的語言學的研究，但某些方面的成就並不差。比如音位的概念，中國人很早就有了，例如無論是唐代守溫和尚的三十字母，還是宋人的三十六字母，當然並不是當時實際的發音中只有這些聲母（作聲母的輔音音素），而是經過了歸併以後得出的結果，不管它的歸併是否完全正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根據音素區別字義的作用來歸併的。漢語四聲的概念很早就提出來了，為什麼是四聲而不是五聲六聲（就字音聲調的實際調值說，永遠不會只是四種），也是從別義的角度來分析的，這就是音位的概念。再如國外的語法化的研究很熱鬧，其實相關的思想我國早在十三世紀就提出了（沈家煊 1994）。很多工作古人都做過了，話也說過了，但很多東西沒有形成嚴密的體系，缺少嚴格的表述。因而需要總結提升。比較而言，這種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總結提升的工作，語音方面做得比較好，現代語言學家把漢語傳統的音韻學理論與現代語音學理論結合進行的研究也比較成功，但語法和詞彙方面做得不夠，語法方面比如傳統虛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被基本上拋開了。詞彙方面好

像是分治的，有的人是傳統的訓詁的研究，另一部分是現代意義上的詞彙和語義的研究。這種狀況應該改變。

2. 新理論的創造。這就是在研究的時候根據漢語的事實來進行理論的創新。在現有的語言學理論中，包括語言發展變化的理論，由中國人發明的似乎不多，對這種情況，有人將其歸為中國人理論思維的缺乏，理論的意識不強。在 21 世紀應該有更多的來自漢語史研究事實的理論成果，能夠進入世界。這倒不是從政治愛國意義上講的，而是說明理論的創新也是可以來自由中國人用漢語事實進行的研究，就像詞彙擴散理論那樣，再比如韓禮德的功能語法也與漢語事實的影響有關。

3. 國外語言理論的借鑒。現代語言學理論的主流是以印歐語系的語言為研究對象而建立的，語言和漢語不同，但理論同樣可以適用於漢語。至於有時候出現了偏差，那不是理論的錯，是應用理論的研究者的錯。理論應該具有普遍解釋力，否則就不成其為理論。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人種不同，但根據西方人體結構建立的人體生理系統的理論同樣可以用來說明中國人的人體結構，西醫也同樣可以治好中國人的病。有一些說法是值得懷疑的，如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理論，要建立適合於漢語自身特點的理論等等，這種說法語義含糊，經不起推敲，貌似正確，但毫無用處。比如什麼叫中國特色？這個政治詞語拿到語言研究中行不行？什麼叫漢語自身的特點？特點都是在比較的基礎上來談的，不知道共性怎麼知道特點？因而我們認為 21 世紀漢語史的研究應該更加注意吸收國外語言研究的成果，注意用國外的語言學理論來說明漢語的事實。

4. 注重研究的科學性。所謂研究的科學性，我以為在漢語史的研究中應該特別注重講求實證、系統地看問題和追求邏輯的嚴密。在漢語史研究領域簡單化的現象，想當然的現象，以今證古的現象時有發生。舉一個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值得商榷之處的例子。康振棟（2003）試圖解釋“了”在中古漢語中為什麼“只限於跟否定詞連用”，結論是“了”在中古是一個強調否定語氣的語氣副詞，直接來源於總括副詞。即當總括副詞用於否定動詞前時，就有了強調否定語氣的作用。但是這樣的結論如果成立，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要舉出“了”用於肯定動詞前作總括副詞的實例，二是要說

明其他的總括副詞如“皆、悉、盡、鹹、俱”等都可以用於否定動詞前，但為什麼唯獨“了”固定在了否定詞前？對於第一個問題，作者舉出的例子是“我財物了盡”之類的同義詞連用的情況，認為這是“了”“由動詞向範圍副詞虛化的根據”，是人們把並列結構重新分析為偏正結構的結果。我們認為要證明“了”由動詞演變為範圍副詞可以舉它出現在其他任何一個動詞前的例子，但唯獨舉用於同義動詞前的例子最沒有說服力。因為同義詞連用是漢語裏非常常見的現象，你說範圍副詞“了”是在這種結構中重新分析來的，無非是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了盡”也可以理解為“都盡”，這是因果倒置的論證方式。對於第二個問題，作者的回答是因為其他的範圍副詞是表示總括，而“了”是表示強調否定，這不是循環論證麼！

二、世界眼光。所謂世界眼光，是指跳出漢語自身來看漢語才能看得更清楚，應該站在世界語言的高度來看漢語的發展，否則就會“不識廬山真面目”。我們不能僅就漢語來說漢語，否則你得出的結論就是值得懷疑的。比如有人認為漢語新詞語中有多音節詞語大量產生，這“顯然跟社會的發展、思維的豐富息息相關。紛繁精細的思維內容已不滿足於依靠構造精密的句子來表達，要求句子的構成要素一一語詞也滿載資訊負荷。這樣，原來在漢語詞彙庫中的雙音複合詞就擔負不了這一交際使命，促使了以三、四音節為主的多音節詞語的產生。”（姚漢銘 1998）^①我們且先不論所謂三四音節詞語大量產生這個結論是否可靠，就算是這樣，這種解釋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按這種說法，就會推出一個必然的結論，即：社會越發展，詞語就越長，而社會總是發展的，所以所有的語言的詞語都應是越來越長的。而且詞越長的社會就越是發展的社會，人的思維就越豐富。這符合世界語言的實際情況嗎？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邏輯。再比如有人說漢語詞綴具有虛實結合的特點，這是由於“漢語沒有也不可能具備嚴格意義上的形態變化”（沈孟璽 1995）。說漢語沒有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基本符合事實，但說不可能有，這是為什麼？是站在語言普遍規律的立場說的？還是站在漢語的立場上說的？至少從國外語法化理論的角度說，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有形態的語言的構形成分也是由實義的詞演變來的，語言在不斷發展，為什麼漢語就一定不可能演變成有形態的語言呢？從漢語歷史的發展來看，現代漢語似乎也比古代

漢語有更多的形態或類形態成分。至少這種結論是難以論證的。我們堅信語言的共性是主要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從其他語言的研究中受到啓發。再比如漢語被動句從古到今都有表義上的特點，即傾向於表示“不幸”、“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這是一個事實，但該怎麼解釋它？主要的意見是認為受到典型被動標記“被”的來源的影響，因為“被”來源於表示“遭受”意義的動詞，所以在成為被動標記後，也把原來的表義特點帶進了被動句（王力 1957、橋本萬太郎 1987、李珊 1994）。這種解釋僅就漢語說也許勉強可以②，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不只是漢語有，張敏（2000）認為：“漢語裏含被動標記的被動句通常含不幸意味，這個特性不僅僅為漢語所獨有，它也體現在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包括漢藏語、台語、孟高棉語在內的多個語言裏，是一項區域特徵。”沈家煊（2001）也談到：“漢語、日語、泰語等語言的被動式都附帶不如意的主觀感覺”。我們考察的結果支援張敏和沈家煊二位先生的結論，似乎還不僅僅是這些語言。如在緬甸語、越南語、印地語、蒙古語、朝鮮語等語言中都發現了類似的現象。③當一種語言現象成為一種區域特徵或語言普遍現象時，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來作出解釋：第一個角度是有相同的內部形成機制。如張敏（2000）談到“具有該特徵（指被動句含有不幸意味）的語言，其被動標記多半來源於[遭受]義、[使役]義和[給予]義動詞”。但除了[遭受]義動詞對被動句表示不幸的語義特征形成的影響有較強的說服力外，由其他兩種意義變來的被動標記何以會對被動句的語義特點構成影響，似沒有令人信服的說明。第二個角度是語言間互相影響的結果。比如是漢語被動句的表義特徵影響了周圍的語言或者是漢語是受了其他語言的影響，如像橋本萬太郎（1987）所說的那樣，漢語被動句標記南方方言來源於“給予”動詞，是受到了南亞語言的影響，北方的被動標記來源於使役動詞，是受了阿爾泰語系的影響。但這樣仍然要解釋，如果是漢語影響其他語言，那麼漢語是怎麼獲得這一特徵的，同時還要說明這種影響是怎麼發生的。第三個角度是把這一現象看成是一種基於認知或功能的語言共性現象。反正不管採取哪個角度，我們都必須面對其他語言的類似現象做出統一的解釋。

三、未來指向。專業分工使我們把研究對象割裂開來了，有專門研究漢語史的，

有專門研究現代漢語的，這樣就要劃一個邊界，某一個時代以前的算史的部分，以後的是現代漢語的部分。其實語言的發展就像一條河流，中間是沒有邊界的。我們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漢語，應該有整體的眼光，所謂未來指向就是得跨躍時代來考慮問題。我們研究漢語史，不僅僅是描寫語言在過去各個時期的語言事實，還原歷史，其根本的價值是探討語言演變的規律，並用這種規律來說明語言的現實表現和未來走向。研究語言的歷史可以有兩個起點。一個是起於今，即從當前存在的語言現象著手，逆流而上，追溯它們的歷史，搞清楚這些現象是從哪兒來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內部擬測法，就是從今天出發來重建歷史的。一個是起于古，即確定一個足夠遠的有文字記載的時代，順流而下，探討語言要素的從無到有，從有到無，從此到彼。作為有大量歷史文獻的語言，後一種起點是漢語史研究更具根本性的東西，因為其研究所站的角度始終是面向未來的。就像我們從一個河流的源頭開始順流而下，每一步都是走向未來的，這樣我們才更便於發現其大致的走向，並從而預測未知，想象未來。我們所說的未來指向有兩層含義，一是在研究某一個時代的語言現象時，要觀照下一個時代。離開對未來時代情況的掌握，我們往往會把問題簡單化。語言的演變並不像歷史比較法所假設的那樣，是很規則的，沿著一個相同的軌道前行的，語言的演變有時是有例外的，不規則的。比如對表示進入意義的“進”的產生年代，太田辰夫（1987）認為始於元代，志村良志（1995）認為直到唐末還未見使用。其實“進”早在東漢，至遲到六朝時期就可以表示前進的意義，且可以作趨向補語了（李宗江 1997、汪維輝 2000）。按照一般的規律，到唐宋時期“進”的用例應該多於六朝，至少不應該少於六朝，可是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在唐宋時代的文獻裏很少見到④，其發展似乎停止了，而到了元明時代才又重新多起來。太田辰夫和志村良志的結論就體現了這一點。這種情況看上去似乎有點違反常規，但這是事實，而且不是個別的現象。如曹廣順（1987）就曾談到副詞“就”，作“迅速”義解的形容詞“快”，代詞“這、這底”，表複數的“們”，句式“動+了+賓+了”，語氣詞“了”和“了也”等六種詞彙語法現象出現“循環變化”的現象，即：宋代用或多用，元代不用或少用，明以後又恢復到宋代的情況。未來指向的另一層意思是說漢語史的研究應該通向現代，甚至瞄向未來。就

是說我們研究的語言歷史的演變規律要能夠解釋現在，甚至預測未來。這樣的期望可能有點高，但科學研究不能不樹立這樣的目標。如果承認語言的演變是有規律的，那麼就得承認是可以見往知來的。當然預測的結果僅僅是一種可能性，最後需要歷史的驗證。比如漢語從古到今同現代漢語副詞“才”意義和用法類似的副詞主要有“始、方、才”等幾個，其意義和用法以“才”為例，主要是：

1. 表示動作在不久前發生。如：他才走。
2. 表示兩個動作距離時間短。如：他才走你就來了。
3. 表示事件發生得晚或事情過程過長。如：他半夜才回家。
4. 表示邏輯關係。如：只有依靠群眾才能做好工作。

前兩種意義上“才”重讀，表示時間概念；後兩種意義上“才”不重讀，淡化時間概念，而強化邏輯上的承接作用。“始、方、才”等幾個副詞的演變規律是先獲得以上1、2兩種用法，然後通過第3種用法發展到第4種用法。我們可以據此建立一個“才”類副詞的演變模型，按照這個模型來觀察現代漢語的副詞“剛”，以上前三種用法它都有了，如可以替換前3個例句中的“才”，只是還沒有第4種用法。我們推測它可能也會向這種用法演變。（李宗江 2000）

在世界跨入二十世紀之前，索緒爾為語言學劃定了地界：語言和言語主要研究語言，形式和意義主要研究形式，共時和歷時主要研究共時……，進入21世紀，語言學的發展已經打破了索緒爾所劃定的界限，語言的共時狀態不過是歷時發展的橫截面，就像不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無法知道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一樣，無論從對語言的認知角度還是從語言應用的角度，當代的語言研究都對語言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作為漢語史學者，也應該有更高的科學追求，我們希望通過如上的追求能夠使漢語史研究出現新的面貌，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

附注

①這段話中所涉及的幾個概念非常模糊，比如“思維的豐富”，“紛繁精細的思維內容”是什麼意思？照此說法，漢語詞原來以單音節為主，那麼說明當時人的思維比現在簡單，比現在粗放？再比如一會說“雙音節複合詞”，一會說“多音節詞語”。要知道“詞”和“詞語”是不同的，如

果把“語”算上，恐怕哪個時代的漢語，哪種語言裏都是多音節的占多數。

②其實嚴格地說對漢語也不能解釋，因為它不能解釋為什麼在“被”字句產生之前的“爲”字句、“於”字句、“見”字句也有這種傾向。

③考察的辦法分爲2種，一種是請某些國家的留學生隨意寫出自己語言的5個被動句。第二種辦法是請學習某種語言的研究生找所學語言的一篇口語性的文學作品，把其中的被動句都找出來，進行分析。

④關於這個結論有不同的意見，董志翹（1998）認爲唐宋比六朝有所發展，用例“觸處可見”，這主要涉及所用語料問題，還可以再討論。但在一些公認的接近口語的唐宋文獻中確實很難見到，如《祖堂集》、敦煌變文、唐詩、《五燈會元》、《朱子語類》以及劉堅、蔣紹愚先生主編的《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的唐五代卷和宋代卷中均未見典型用例。

參考文獻

- 曹廣順（1987）試說“快”和“就”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第4期
- 董志翹（1998）再論“進”對“入”的歷時替換，《中國語文》第2期
- 蔣紹愚（1995）內部構擬法在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運用，《中國語文》第3期
- 康振棟（2003）中古漢語裏否定詞前的“了”字，《中國語文》第4期
- 李 珊（1994）現代漢語被字句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宗江（1997）“進”對“入”的歷時替換，《中國語文》第3期
- 李宗江（2000）漢語“才”類副詞語法化的規律，《面臨新世紀挑戰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陸儉明主編，98 現代漢語語法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
- 魯國堯（2003）論“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古漢語研究》第1期
- 橋本萬太郎（1987）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中國語文》第1期
- 沈家煊（1994）語法化研究綜觀，《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 沈家煊（2001）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第4期
- 沈孟璽（1995）試論新詞綴化的漢民族性，《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
- 太田辰夫（1987）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汪維輝（2000）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大學出版

王力（1957）漢語被動式的發展，《語言學論叢》第 1 輯

姚漢銘（1998）新詞語社會文化，上海辭書出版社

張敏（2000）語法化的類型學及認知語言學考量，中國第九屆近代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溫州）

張永言（1985）訓詁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

北京大學中文系 胡敕瑞

【摘要】本文圍繞中古漢語語料的鑒別，簡要論述了中古語料存偽的情況、鑒別的方法、有效證據、以及注意事項，同時也穿插介紹了中古語料鑒別的一些成果。語料鑒別，其目的是為漢語史研究提供真實、典型的語料，限於篇幅，文中只討論了語料真實性問題。

【關鍵詞】中古漢語、語言鑒別、語料與史料

一

漢語史是研究漢語歷史發展的一門學問。要研究漢語的歷史發展，就必須依賴歷代保留下來的語料。如果不分時代，熔語料於一爐而治之，即便象《馬氏文通》那樣的開拓之作也難逃詬病；如果不辨真偽，把時代有誤的語料用來作研究，那更無異於是沙灘造屋。所以，在當今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時，語料的鑒別同樣應引起重視。

語料鑒別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首先，語料鑒別可以為漢語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保障。“在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資料選擇。資料選擇得怎樣，對研究結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太田辰夫 1958，第 380 頁）其次，語料鑒別也可以為文獻學解決一些難題，如作品斷代、作者判定等。不少學者曾從語法、詞彙、語音等角度，對一些存有疑問的作品或作者作出過卓有成效的鑒定。再次，語料鑒別多從詞彙、語法、音韻等角度入手，從這一點來說，語料鑒別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研究。

* 本文承蒙蔣紹愚師和沈培先生提供相關資料，蔣紹愚師并撥冗審閱了初稿。在此謹致謝忱！

汉语史研究需要充分占有语料，如果不作鑒別而誤用語料，就會帶來描寫不精或論斷不確的後果。譬如有學者在描寫《齊民要術》中“於/在十處所”句法位置的變化時，沒有區分卷首《雜說》等後世摻入的內容，描寫顯得粗糙，因而使得統計數據和結論抵牾；又如有學者引用署名為安世高的《佛說處處經》“佛言：意但當分別六衰，不當著著便不得道”一例，來說明體態助詞“著”已經在東漢出現，這恐怕是誤用語料的一個失斷¹，因為《佛說處處經》被證明并非東漢安世高所譯。由此足見，語料鑒別在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前人（特別是清人）對上古語料做過不少董理辨偽的工作；相對來說，他們對中古以後的語料整理鑒別較少。為此，本文以中古語料的鑒別為主旨，概要介紹中古語料的鑒別情況，以期引起學界對中古語料鑒別的重視。

二

2.1 語料存偽的情況

梁啟超（1996，第305頁）曾說：“無論做那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為此，他舉出歷史上大批造假的時期有“戰國之末、西漢之初、西漢之末、魏晉之交、兩晉至六朝、明中葉以後”六個，並且把偽書的性質分為十類²。就自己目力所及，中古語料存偽的情況（包括偽託作者、時代有誤、內容摻雜等），似可別為以下幾類：

- 1) 有些託名上古的著作，實際上是中古的作品。如託名列禦寇的《列子》、託名西漢孔安國的偽孔傳，其實都是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只是作者有問題，內容

¹ 這個例子不但時代有問題，斷句也不當。句當讀作“佛言：意但當分別六衰，不當著，著便不得道。”兩個“著”都是動詞，義為“貪染”。兩個“著”並不連讀，第二個“著”並非表示前一個“著”的狀態。

² 梁氏所總結的偽書十類為：1) 古書中偶見此書名，其書曾否存在渺無可考，而後人依名偽託者；2) 本有其書，但已久佚，而後人竊名偽造者；3) 古並無其書，而後人嫁名偽造者；4) 偽中出偽者；5) 真書中雜入偽文者；6) 書不偽而書名偽者；7) 書不偽而撰人姓名偽者；8) 原書本無作者姓名年代，而後人妄推定為某時某人作品，因以成偽或陷於時代錯誤者；9) 書雖不全偽，然確非原本者；10) 偽書中含真書者。

並無刻意擬古³。

- 2) 有些作品的年代雖有問題，但不出中古時期。如有些署名東漢譯人的譯經、認為漢末之作的《孔雀東南飛》等，這些作品雖然不能當作東漢語料運用，但當作中古語料使用仍然可以。
- 3) 有些注明為中古的作品，其中卻有近代摻入的內容。如《齊民要術》確為北魏賈思勰之作，但開首《雜說》則不是賈思勰的原著，很可能是唐人手筆。
- 4) 有些確定為中古的偽作，其中卻有上古原書的內容。如《孔叢子》確為晉人偽作，但其中《小爾雅》一篇，則為《漢志》舊本，應是秦末人孔鮒所撰。

第 1) 類雖然作者的真實性有問題，但如果因此廢置不用，則會喪失一些有價值的中古語料；第 2) 類雖然年代的真實性有問題，但把它們當作中古語料來使用不會有誤；第 3) 類如果不考慮語料的變化性，就會把近代的一些語料誤當作中古的語料來使用；第 4) 類如果不考慮語料的傳承性，又會把上古的一些語料誤當作中古的語料來使用。

在辨別語料存偽情況的同時，應特別注意語料之中的史料。研究歷史利用史料要辨別真偽，研究漢語史利用史料也要辨別真偽，不過兩者研究的對象不同，因而確定真偽的情況也不同。歷史學看重史料所記載的歷史事件是否真實，而漢語史則看重史料所運用的語言是否真實。

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如果史書敘述的時代與編著的時代不同，是以史書敘述的年代為標準，還是以編著的時代為標準？王力（1958，第 19 頁）在談到漢語史研究時，尤為強調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所謂認真地審查研究的對象，就是要辨別史料的時代。……有些書雖然不是‘偽書’，但是我們不應該以書中所敘述的時代為標準，而應該以著書的時代為標準。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這段話涉及到史料處理的兩個問題：1) 編著者的時代是否同於史料所敘述的時代？2) 編著者記錄前世的說語（即記言部分）是否同於編著者編輯的前世資料（即記事部分）？

³ 有些作品是刻意仿古，語言桀屈放牙，完全脫離造假時代的語言現實，如偽《古文尚書》，這類語料的利用價值，與上面一類不可相提並論。

對於第一個問題，洪誠（2000，第106頁）認為“著書時代不能作為辨別一切史料時代的標準”，並認為王力的原則只適用於部分史料，不能用之於一般。而且這一原則要具備三個條件：1）這種史料全部是著者自己的語言；2）這種史料在客觀上必須是同類的各種著述中最早的一部，最低的限度在現存的著作中是某種語言現象最早的紀錄；3）它裏面沒有直接引述的前代語言。這樣看來，《史記》勉強符合條件，因為司馬遷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語言來記述史料⁴；而《晉書》等就不一定，因為房玄齡等編撰時多採用前代材料（如採用《世說新語》《郭子》《啓顏錄》等），其中採錄《世說新語》就達400餘事。在洪誠看來，《晉書》這類史料的語言不能視為著書時代的語言，王力的原則只適合於著者用自己語言記述的史料，而不適合於著者編纂的史料。柳士鎮（1988）則似乎同意王力的觀點，認為“以成書年代作為史料時代的原則是比較穩妥的”。

對於第二個問題，有人認為應該將史料分為記事和記言兩部分，記事部分可以算是著者時代的語言，而記言部分則應視為說者時代的語言。這等於承認，史料中記言部分的語料要比記事部分的語料早。首肯這一結論的前提是必須保證史家在編著史料時，是原樣照錄歷史人物的言語聲吻。但是，這一前提很難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古代沒有錄音設備，何以保證史家用的都是“直接引語”；即便依賴前時檔案保留了“直接引語”，後代編者也難免會有改動。柳士鎮（1988）通過對《晉書》和《世說新語》的比較，證明《世說新語》中的人物言語在《晉書》中並非原文照錄，這一證明無異於否認了上面“記言部分應視為說者時代語言”的觀點。所以，王力認為“書中所敘述某一個古人的談話，也不能輕信為那古人當時的語言”還是有道理的。

2.2 語料鑒別的方法

語料的鑒別離不開比較，而比較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如果從語料之間的比較來看，方法有三：

1)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文本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齊民要術》卷前《雜說》與同書其他正文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卷前《雜說》當是近代雜入。證據有：A.

⁴ 司馬遷雖然也引用上古材料（如《尚書》等），但多用其當時的語言改寫。

詞彙上，如表示“耕田後平整土地的動作”義的詞語，《雜說》用“蓋”或“蓋磨”，而其他正文用“勞”為常；《雜說》有“第二遍”這樣詞頭與動量詞結合的用例，而其他正文無；B. 語法上，如《雜說》有“兩個月”這樣用量詞“個”來計時的用例，而其他正文無；《雜說》中“著”有體態助詞的用法，而其他正文中的“著”多是實義動詞；《雜說》多見“了”的虛化用法，而其他正文少見。（柳士鎮 1989）

2)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作者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被確定為安世高所譯的《法受塵經》與安世高的其他譯經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法受塵經》不是安世高所出⁵。證據有：A. 安世高譯經中第一人稱代詞幾乎都用“我”（共 162 例），只有兩例用“吾”，而這例外的兩例正出現在《法受塵經》中；B. 安世高譯經首句多是“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而此經首句是“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⁶；C. 此經用“是以”等文言詞，而不見“用是故”等見於安世高譯經中的詞語；D. 此經中多用“之”，而在安世高的譯經中少用“之”⁷；E. 此經中出現舊詞“女子”，這不但在安世高的譯經中是絕無僅有，乃至在整個東漢的譯經中也屬罕見，東漢譯經主要用新詞“女人”（達 264 例之多）⁸。

3) 被懷疑語料與同一時代的其他語料作對比。譬如託名東漢所譯的《大方便佛報恩經》與東漢同期的其他譯經相比較，通過比較，可以證明《大方便佛報恩經》並非東漢所出。證據有：A 詞彙上質的不同，《大方便佛報恩經》有“村”“覓”等新詞，而在時代確定的東漢佛經中不見這些新詞，只有語義相同的“聚/落”“求/索”等舊詞；B. 詞彙上量的不同，《大方便佛報恩經》“喚”19 見、“看”13 見，而在時代確定的東漢譯經中“喚”雖有 5 見，但其中 3 例有異文作“呼”，而“看”也僅僅 1 見，東漢譯經仍然多用“呼”“見”等詞，少用“喚”“看”等詞。

⁵ 如果考慮到口譯和筆受等複雜情況，結論恐怕並非如此簡單。

⁶ 《道行般若經》首句“佛在羅閱祇者闍崛山中”在《大明度經》中也對譯為“一時佛遊於王舍國其鷄山”。一般認為前者口語性強，後者文言成分濃，所以前者用比較口語化的“在”，後者則用文言化的“（遊）於”，可以與此處相印證。

⁷ 在被認為安世高的 16 種譯經中，竟然有 12 種譯經沒有見到“之”，只有 4 種譯經中有“之”，《法受塵經》就是其中之一。

⁸ “女子”在整個東漢譯經僅見兩例，除《法受塵經》中一例外，在《中本起經》還見一例。《中本起經》屬於文言成分較多的東漢後期譯經，出現一例“女子”不足為怪；而安世高譯經屬於東漢前期譯經，前期譯經口語性強，不應當出現文言詞“女子”。

如果僅從語料自身著眼，語料鑒別又可從文獻學（包括“著錄”“卷數”“文例”等），文化學（包括“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語言學（包括“詞彙”“語法”“語音”等）等角度入手，也可以綜合幾者來鑒別。

1) 從文獻學角度鑒別

首先，可以從著錄上考察。餘嘉錫（1983，第1頁）有言“或得一古書，欲知其時代、撰人及書之真偽，篇之完缺，皆非考之目錄不為功。”中古中土文獻若不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唐·魏征等編）和《崇文總目》（宋·王堯臣等編）等，便值得懷疑；中古漢譯佛典若不見著錄於《出三藏記集》（梁·僧祐撰）、《衆經目錄》（隋·法經撰）、《開元釋教錄》（唐·智升撰）等，也值得懷疑⁹。如在《出三藏記集》和《衆經目錄》中都收錄了《大方便報恩經》，但均定為失譯，並未注明時代、譯人，後來誤託東漢支讖所出並無經錄證據¹⁰。

其次，可以從卷數上考察。古籍流傳，卷數一般是由多變少，而不會是由少變多。如果卷數越來越多就值得懷疑，如《鶡冠子》在《漢志》中著錄僅一篇，而在《崇文總目》中則著錄為三十篇。據此可以判定《鶡冠子》一書顯然有偽，或託舊題而作、或據舊作添加，總之已非原書。

再次，可以從文例上考察。在此僅舉通假之例和用字之例，如《列子》中有以“童”通“同”、“住”通“數”、“肆”通“叱”、“視”通“指”等通假之例，張永言（1991）認為這些通假都是羌無故實的自我作古，因為在上古語料中並不見類似的通假，由此可見造偽者的斧鑿之迹。又如“見/現”“景/影”“華/花”“舍/捨”“采/採”“要/腰”等異體，斜線後者多是漢以後常用字例，所以如果某一語料多用後一種字例，則有助於確定其為中古語料。但由於文本流傳歷經抄寫，字例不一定反映原作原貌，其中不排除鈔胥的手改，因此字例最多只能作為一種旁證。

2) 從文化學角度鑒別

因為只有後人徵引前人而不會前人徵引後人，所以如在一部確定為某時某人的作

⁹ 自東晉道安編撰《佛經目錄》把可疑的佛經專門編入《疑經錄》以來，後來編撰的佛經都很注意辨偽的工作，如《衆經目錄》分別五例，第四例“疑偽”專收可疑或確偽的佛經。

¹⁰ 在隋僧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中開始著錄了一卷本和七卷本兩種，并注明一卷本為沙門支讖譯，誤託譯者蓋始於此。

品中出現了其後才有的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文化內容，就有作偽的嫌疑¹¹。

譬如《列子》中有“西域”地名，而宋人黃震在其《黃氏日鈔》中指出“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可見此書當不作於漢代之前；又《列子》中見“鍔鋸之劍”“火浣之布”等名物，張永言（1991）指出這都是由西土流入而盛傳於魏晉的名物，可見此書應當是魏晉人所作。

又如《孔雀東南飛》中“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一句，徐復（1958）認為其中“第五郎”應是虛指，典出《世說新語·棲逸》“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因此，世以“第五郎”來泛稱瀟灑男子。又《孔雀東南飛》中“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一句，其中“初陽”指初春，東晉人諱“春”字，所以把“春”改為“陽”。據此，此詩應非漢末建安詩人所為。

前一例是通過地名、名物來鑒別《列子》為晉人所偽；後一例是通過用典、避諱來鑒別《孔雀東南飛》非東漢作品。除地名、名物、典故、避諱之外，文化學的證據還有人名、年號、官制等等。

3) 從語言學角度鑒別

首先，可以從詞彙上考證。譬如梁曉虹（1996）通過“專有名詞”和“一般用語”，來證明《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A. 專有名詞的證據，如康僧會所譯的《六度集經》喜用“泰山”“溝港、頻來、不還、應真”“除鐘”等意譯詞，而《舊雜譬喻經》喜用“泥犁”“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羅漢”“比丘”等音譯詞；B. 一般名詞的證據，如《六度集經》中用“巨細”“大理家、理家”等，而《舊雜譬喻經》中用“大小”“大姓”等。

利用詞彙來鑒別語料，應當選用有價值的詞語。具有時代、方言、發展特點的詞語，比較適宜作為鑒別的標準。A. 具有時代特色的詞語，如《孔雀東南飛》“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一句，其中的“蘭”就是一個有晉代特色的俗詞，義同“某”。《列子·說符》也有兩例：“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張湛注“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又《孔雀東南飛》“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

¹¹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文化学上的地名、名物、典故、避諱等也有后人挖改的可能，所以在鉴别语料时不能光凭此种例证；况且这种例证往往只是个别的，缺少普遍性。

歸”中的“姥”也是晉代始用的一個詞語。根據這些具有晉代特色的詞語，可以鑑定《孔雀東南飛》當是晉人所作。（徐復 1958）

B. 具有方言特色的詞語，如《論衡·自紀》“以聖典示小雅，以野言說丘野。”劉盼遂《集解》引《集韻》云“吳人呼赤子為牙子。”並謂“今中國江、淮之域尚多呼小兒為小牙者”。又《論衡·死僞》“樂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章炳麟《新方言》卷六謂“今浙江猶謂棺之前端曰前和，音如華。”“小雅”“和”都是吳地方言詞。又《論衡》書中“或時”幾乎都作“或許”解，同樣的例子在東漢安世高、支謙的譯經中也可見到，這應是當時洛陽一帶的一個方言詞。王充出生吳地（會稽上虞），遊宦洛陽，上面幾個方言詞正好與他的身世相合。清人梁章鉅認為《論衡》“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為”，不可信從。

C. 新詞（尤其是新興常用詞）新義（尤其是新興核心義）的價值。如汪維輝（2000，2001）根據“阿娘、阿婆、合眼、渾身、全家、歇、醒、要緊”等新詞，鑒定八卷本《搜神記》為北宋人作；又如張永言（1991）根據“侵”有“逼近”、“擬”有“準備”、“移時”有“過了好一會兒”新義，楊伯峻（1956）根據“舞”有“戲弄”新義，鑒定《列子》為晉代人作。

其次，可以從語法上考證。譬如曹廣順、遇笑容（1998）通過四種語法現象的考察，證明《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這四種語法證據是：A. 總括副詞“都”的使用，《六度集經》（48 見）比《舊雜譬喻經》（3 見）使用頻率高得多；B. 完成貌句式中使用的完成動詞，《六度集經》有“已、竟、訖、畢”，《舊雜譬喻經》有“已、訖、畢”，但後者更趨向用“已”；C. 動詞連用格式的使用，《六度集經》超過 80 例，常用“化為（43 見）”、少用“化作（3 見）”，《舊雜譬喻經》有近 30 例，常用“化作（7 見）”、少用“化為（2 見）”；D. 疑問句式的使用，兩者疑問詞和語氣詞有差異，《六度集經》用“孰”“云何”等舊式疑問詞，且好用語氣詞“乎”；《舊雜譬喻經》不用“孰”“云何”等舊式疑問詞，語氣詞“乎”比前者少，反復問句末多用“不”。

再次，可以從音韻上考證。譬如徐復（1958）認為魏晉有陽唐和東韻通押、脂微皆灰哈和支韻通押、魚和尤侯的雜押的現象，《孔雀東南飛》中正好也有與魏晉用韻相

符的例證。如“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為陽唐和東韻通押；又如“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此為脂微皆灰哈和支韻通押。又如“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諸，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為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此為魚和尤侯的雜押。

4) 從綜合角度鑒別

語料中顯現的證據不一定成系統，有的只是一鱗半爪。因此，在鑒定語料時，不能僅憑單方面的只文孤例，而應該綜合諸法。如徐復（1958）考證《孔雀東南飛》為晉人所作，就是綜合詞彙、語法、用韻、用典、避諱等多方面的考證得出的結論。又如張永言（1991）考證《列子》為晉人張湛所作，也是結合假借文例、新詞新義、名物詞語等多方面的考證得出的結論。

2. 3 語言鑒別的有效證據

雖然綜合利用諸種證據是值得提倡的鑒別方法，但是也必須承認，在文獻、文化、語言三種鑒別方法中，語言鑒別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方法。因為，雖然造假者有心作偽，可以避免在一些文化常識上露馬腳，但是他畢竟不是語言專家，在謔詞造句的時候難免不露蛛絲馬迹；其次，通過語言例證，不僅可以鑒別古籍的真偽、審定其寫作年代，還可以從方言的語法、用詞等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此外，語言的證據也總是要比文獻、文化的證據常見易得，因為文獻、文化的證據零星少見，而任何語料都不能不形諸語言。

詞彙、語法、音韻是語言鑒別可資利用的三種證據，但三者的價值和效用是否又相等呢？其中是否可以區分出更為有效的證據呢？一般來說，有效的證據應當是“普遍性好、規律性強”的材料，下面用一個表格來條分三者的情況：

情 况 方 面	項 目	變化速度	變化數量	變化規律
語音		慢	少	強
詞彙		快	多	弱
語法		較慢	較少	較強

由上表可見，語音變化速度慢，數量也少；雖然規律性強，但普遍性顯然不及語法，更不及詞彙。這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證據，因為韻文的材料畢竟有限。

詞彙變化比語法速度快、數量也多，普遍性好，因而有些學者（如徐復、汪維輝）特別強調詞彙證據。徐復（1958）認為“它是最現實的，也是變化最敏感的東西，只要時代一有了變化，它就跟著產生了新的詞語。所以要推測一篇作品的寫作年代，只有從詞彙中去探求，才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古韻和語法上的一些變化，在考證年代上，只作為輔助的辦法。當有了語言上別種強有力的證據時，這些事例可以作個次要的證據的。”針對詞彙比語法規律性弱，汪維輝（2000）強調“詞彙同樣具有時代性，一個詞或一個義項始見於何時，雖難以說得絕對準確，但大體上是可以考定的。尤其是一些在歷史上有過歷時更替關係的常用詞，它們的發展變化很有規律，時代性尤為明確。”因此他認為“從語言角度鑒定古籍年代，詞彙也應該是一項重要的依據，至少跟語法現象有著同等的價值，甚至可能比語法方面的證據更可靠，因為一般說來，詞彙比語法變得快，時代性更強。”

語法雖然比詞彙變化速度慢、數量要少，但普遍性比語音好、規律性比詞彙強，因而有些學者（如江藍生、柳士鎮）特別強調語法證據。江藍生（1987）認為“與詞彙相比，語法方面的現象更具有規律性、普遍性，因而也更可靠些；詞彙方面，由於我們畢竟不能遍覽群書，見聞難免漏缺。所以詞彙方面的現象難以與語法方面的同等對待，把他們作為參考鑒定詞比較合適。”柳士鎮（1989）承認語法變化的速度比不上詞彙，“但是，也正因為它們的發展變化比詞彙要緩慢，因而它們一旦發生了變遷，

其鑒別作品時代性的作用也就顯得更加重要而可靠。”

誠然，詞彙變化速度快、數量多，在沒有或罕見語法、語音證據的語料中，詞彙的例證自然獨佔鰲頭，它的有效性突出表現在證據的數量上；語音和語法變化速度慢、數量少，但在同時兼有三種證據的語料中，語法和語音的例證應當另眼相看，它們的有效性突出表現在證據的質量上。語料鑒別的有效方法，應是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證據，普遍性和規律性相結合，質量並重，而不應厚此薄彼。江藍生（1987）根據六個語法證據（疑問副詞“還”、測度副詞“莫”、概數助詞“以來/來”、助動詞“要”、人稱代詞“你/某”、自稱代詞“兒/兒家”）、四個詞彙證據（遮莫、伍伯、關節、心口思維）考定八卷本《搜神記》出自晚唐五代或北宋人之手，方一新（2003）根據三種語法證據（判斷句、被動句和疑問句）、兩種詞彙證據（一般語詞和“～切”式複音詞）考定《大方便佛報恩經》為魏晉以後譯經，都是綜合利用語法、詞彙證據的成功範例。

四

鑒別語料，去偽存真，既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也是一項細緻的工作。前賢時哲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績；但是也應該看到，也存在某些不足。針對這些不足，可以歸納兩點注意事項：

1) 用作鑒定的例證一定要準確可靠。譬如徐復（1958）為鑒定《孔雀東南飛》非東漢而是晉代之作，舉出詩中用了“不堪（不能忍受）”“爾（應答聲）”“啓（啓白）”等晉代新詞。然而，這些例證并不可靠，因為東漢已有這些詞，它們并非晉代新詞，僅舉東漢佛典為例：

《阿闍世王經》：“其器者以不堪菩薩心。”

《道行般若經》：“須菩提報佛言：“爾，天中天！”

《修行本起經》：“當卜所宜，別自啓白。”

又如梅祖麟（1982）舉出方位詞“裏”、動量詞“通”、詢問詞“那”、非被動“見”、第三身代詞“渠”、著重語氣的“是”、暱稱“卿”、必然義的“會”、隨即義的“登即”、後置詞“復”等10項虛詞的用例證明《焦仲卿妻》之作不應早於五

六世紀，但是魏培泉（1993）觀察到，除動量詞“通”和第三身代詞“渠”外，其餘8項都有見於漢代的例子。如此看來，徐、梅二人用作鑒定的例證不但不成證據，反倒是成了反證。所以選用例證來鑒定語料時，一定要選用準確可靠的例證。

2) 用作鑒定的例證一定要有代表性。譬如梁曉虹（1996）為鑒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作，舉出《舊雜譬喻經》中的“大姓”和《六度集經》中的“理家、大理家”用詞不同，這個例子恐怕不具代表性。因為兩個名詞並非如其所言都是表示“世家、大族”義的等義詞，“理家、大理家”應該是“財主、大財主”的意思。兩詞詞義各異，又不是同經異譯，缺少可比性。又如方一新（2003）根據語法、詞彙有效地證明了《大方便佛報恩經》非東漢譯品，但其中所用的“全身”等詞似乎還可商榷。因為東漢佛典雖無“全身”，但是可以見到“盆頭”。如果東漢佛典沒有“髒物汗身”這一概念，自然不會用“全身”一詞；如果真有“髒物汗身”這一概念，根據東漢佛典有“盆頭”，出現“全身”一詞並非不可能。所以選用一般詞語來鑒定語料，一定要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

為了更好地開展中古漢語研究，有必要對期間的中土文獻和漢譯佛典進行系統的搜集、整理和鑒別。中古漢語語料的鑒別，目的是為中古漢語研究提供理想的語料。理想的語料既要可靠，又要典型。可靠即要求材料真實，典型即要求口語性強。限於篇幅，本文只論述了前一個問題，後一個問題容後再論。

參考文獻：

曹 焯 1994：南北朝至明代的音韻學史料概論，《吳中學刊》第2期。

曹廣順、遇笑容 2000：從語言的角度看某些早期譯經的翻譯年代問題，《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
巴蜀書社。

1998：也從語言上看《六度集經》與《舊雜譬喻經》的譯者問題，《古漢語研究》第
2期。

曹廣順 1987：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第3期。

曹培根、曹焯 1991：漢語史料學概論，《吳中學刊》第4期。

- 岑仲勉 1958:《列子》非晉人偽作,《两周文史論叢》,商務印書館。
- 陳連慶 1981:《列子》與佛經的因襲關係,《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
- 陳雅飛 2003:近四十年來《蘭亭序》真偽的三次論辨,《文史知識》第 2 期。
- 程章燦 1994:《西京雜記》的作者,《中國文化》第 9 期。
- 方一新 1996:東漢語料和詞彙史研究芻議,《中國語文》第 2 期。
- 2000:《大方便佛報恩經》語彙研究,《浙江大學學報》第 5 期。
- 2002:漢譯佛典語料的使用和鑒別,第三屆“海峽兩岸漢語史研討會”論文。
- 2003:翻譯佛經語料年代的語言學考察——以《大方便佛報恩經》爲例,《古漢語研究》第 3 期。
- 2004:作品斷代和語料鑒別,《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簡報》(總)第 13 期。
- 高小方 1999:洪誠先生對於漢語史語料學的貢獻,《南京社會科學》第 12 期。
- 古苔光 1976:《西京雜記》研究,《淡江學報》第 15 期。
- 洪 誠 2000:關於漢語史材料的運用問題,載《洪誠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
- 季羨林 1957:《列子》與佛典——對於《列子》成書時代和著者的一個推測,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人民出版社。
- 江藍生 1987: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中國語文》第 4 期。
- 蔣紹愚 1994:《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六章第一節“作品的斷代”,北京大學出版社。
- 勞 榦 1962:論《西京雜記》之作者及成書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3 本。
- 梁啓超 192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四章),東方出版社 1996。
- 梁曉虹 1996:從語言上判定《舊雜譬喻經》非康僧會所譯,《中國語文通訊》第四十期。
- 劉 禾 1980:從語言的運用上看《列子》是偽書的補正,《東北師大學報》第 3 期。
- 劉文忠 1984:《漢武故事》寫作時代新考,《中華文史論叢》第 2 期。
- 柳士鎮 1988:《世說新語》《晉書》異文語言比較研究,《中州學刊》第 6 期。
- 1989:從語言角度看《齊民要術》卷前《雜說》非賈氏所作,《中國語文》第 2 期。
- 陸侃如 1929:《孔雀東南飛》考證,《國學月刊》第 3 期。
- 呂叔湘 1986:《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彙釋·序》,《中國語文天地》第 6 期。

- 馬 達 1996: 對清代關於《列子》辨偽的匡正,《衡陽師專學報》第5期。
- 馬振亞 1995: 從詞的運用上揭示《列子》偽書的真面目,《吉林大學學報》第6期。
- 梅祖麟 1982: 從詩律和語法來看《焦仲卿妻》的寫作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第2分。
- 牟玉亭 1994: 文獻目錄與古籍辨偽,《古籍整理與研究學刊》第3期。
- 太田辰夫 1958: 《中國語歷史文法·跋》(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 唐鈺明 1993: 利用佛經材料考察漢語詞彙,《中山大學學報》第4期。
- 汪維輝 2000: 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上),《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巴蜀書社。
- 2001: 從詞彙史看八卷本《搜神記》語言的時代(下),《漢語史研究集刊》第四輯,巴蜀書社。
- 王 力 1958: 《漢語史稿》(上)第一章“緒論”,中華書局 1980。
- 王範之 1963: 《穆天子傳》與所記古代地名和部族,《文史哲》第6期。
- 王魁偉 1994: 太田辰夫語料觀說略,《日本研究》第1期。
- 1995: 讀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中國語文》第2期。
- 2000: 關於語料問題的幾點思考,《福州大學學報》第3期。
- 王 顯 1996: 從史實和用詞來確認《離騷》等篇的作者,載《古漢語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
- 王 越 1933: 《孔雀東南飛》年代考,《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1: 2, 15-29頁; 1: 3, 69-80頁。
- 王雲路 1995: 漢魏六朝語言研究與中古文獻,《中國語言學報》第七期。
- 魏培泉 1993: 論用虛詞考訂《焦仲卿妻》詩寫作年代的若干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3分。
- 徐 復 1958: 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作年代,《學術月刊》第2期。
- 許威漢 1982: 從《世說新語》看中古語言現象,《江西師院學報》第2期。
- 楊伯峻 1956: 從漢語史的高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新建設》第7期。
- 1979: 《列子集釋》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中華書局 1997。

余嘉锡 1983:《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理明 1987: 漢魏六朝佛經在漢語研究中的價值，《四川大學學報》第 4 期。

張能甫 2000: 對《東漢語料和詞彙史研究芻議》的補說，《古漢語研究》第 5 期。

張爲騏（民國）：孔雀東南飛年代祛疑，《國學月報》2 卷 11 號。

張永言 1991: 從詞彙史看《列子》的撰寫年代，《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承平 1991: 應當重視文獻語言材料和方法的研究，《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 3 期。

学术交流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来我中心讲学

2003年12月2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吴福祥研究员来我中心作了题为《语法化述要》的学术讲演。吴福祥研究员首先解释了何谓“语法化现象”,他认为“语法化现象”是指一种语言演变的过程或现象,即语法范畴、语法形式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在介绍了几种重要的语法化研究文献后,他详细阐述了语法化研究的几个角度,其中包括共时语法化研究和历时语法化研究。在重点论述历时语法化研究时,他介绍了语法化过程、语法化斜坡、语法化链等理论问题。最后,吴福祥研究员还对语法化原则、语法化的条件以及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作了翔实而系统的论述。在讲演结束以后,吴福祥研究员热情回答了本中心师生提出的问题。这次讲学开阔了师生视野,使大家获益不少。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来我校讲学

2003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沈家煊先生来我中心作了题为《语用原则和语言演变》的讲演。沈先生首先介绍了什么

是语用原则以及语用原则的特点，接着他介绍了语用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本次讲学沈先生着重是谈语用原则中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汉语语用中的运用。他认为合作原则就是要遵循语用信息表达中的适量原则，而适量原则就是信息表达的足量和不过量，也就是语用中的足量准则和不过量准则，利用这两个准则，沈先生区分了汉语语用中的隐含义、衍推义和预设义，并且分析了这三种意义在句子中的特点。礼貌原则在汉语语用中的情况，沈先生也加以介绍，并分析了礼貌原则的词义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另外，沈先生还分析了言语行为在语用中对词义形成演变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最后，沈先生一一回答了师生的提问，他的博学、智慧和幽默给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我中心师生的一致好评。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遇笑容先生来我中心讲学

2003年12月25日晚，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遇笑容先生来我中心作了题为《汉语接触与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报告。在讲学中，遇先生首先介绍了她在1997年至2002年间以梵汉佛经对堪研究为突破点来探寻汉语史上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影响的过程与方法。她指出：汉语史上语言接触呈环状而非平面之态；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机制，但不是决定因素；与语音、词汇系统相比，汉语语法史上由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并不多，语法系统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遇先生的热情感染了在座的所有师生，她形象生动的讲学方式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语文》副主编刘丹青教授来我中心讲学

12月26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副主编刘丹青莅临本中心,为大家作了题为《语言类型学与汉语演变》的学术报告。类型学是一个刚刚新兴的课题,在中国也还没有完全普及,刘丹青先生从语言类型学的背景——历史背景和现代背景,类型学的方法论基础、现代新发展,以及类型学成果与汉语事实或通行观点的相互挑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也包括他最近的研究发现。最后刘先生又从人类学角度谈了一些语言共性和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并作了在古代汉语和汉语史研究中引进类型学范畴的大胆尝试。

刘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新颖独特、另辟蹊径,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师生们纷纷请教提问,热情的刘先生都一一作答,气氛热烈而融洽。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曹广顺先生来我中心讲学

12月2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曹广顺先生莅临本中心讲学。曹先生就其论文《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历史视角》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曹先生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侧重从“地域差异”和“历史观念”这两个视角,对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些重要语法现象作了独到的考察和分析。他特别强调方言差异给汉语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汉语史,应该关注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平面的描写,而应该放在更大的语言背景下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特征和规律未必贯穿整个历史时期,而往往只适用于某一或一些特定的时期。

曹先生的讲学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听讲师生表示:曹先生的讲学和他的独特研究视野给人许多启迪,希望中心今后多举办这一类的讲座。

颜洽茂教授出席第七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

我中心颜洽茂教授于2003年12月25日-2004年1月1日在台北出席了由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田家炳文教基金会主办，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协办的第七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并应邀担任语言分析组分场报告主持人。颜洽茂教授在会上发表了《同素反序词新探》论文，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还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谢世涯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竺家宁教授、日本松山大学方经民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涉及汉语语言、文字、词汇、语法、语意及语用之研究，以及汉语与外国语、汉语与方言、两岸语文之比较研究。

学术交流

xueshujiapiaoliu

方一新、王云路教授应邀访问香港科技大学

36

应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之邀，2004年2月13—17日，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王云路教授赴香港科技大学，参加“汉语词汇的演变”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的一个双边小型的学术研讨会。会上，方一新、王云路教授分别作了《中古时期词义演变、构词途径及结构分析》、《谈谈词组和短语成词的主要类型》的学术报告；科技大学的五位先生作了五场报告，即：丁邦新教授《关于汉语词汇研究的两点意见》、张洪年教授《早期粤语中的指示词“个”字》、张敏副教授《先秦两汉汉语的一对反向别义词——“余”和“臬”》、朱晓农博士《满字半字解》、孙景涛博士《论“一音一义”》。

两校学者都认为，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对增进双方的了解、扩大学术交流的领域都很有好处。正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的北京大学的何九盈教授、邵永海、杨荣祥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杨永龙博士、海南大学的辛世彪教授、广西师大的梁金荣副教授等也参加了研讨会。

我中心与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签约

2004年1月11—14日，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谢大宁教授应邀访问我校，汉语史研究中心负责人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教授和谢教授见面，商谈如何进一步进行学术交流事宜。早在2002年秋季，我中心方一新教授应邀访问中正大学中文系时，就已代表汉语史研究中心和中正大学中文系时任系主任的竺家宁教授签约，商定在诸多领域进行学术交流。谢教授本次来访，寻求扩大交流的系所，签订、落实新的协议，受到我校相关系所师生的欢迎。12、13日两天，谢教授分别在中文系、哲学系作了两场学术讲演。14日，在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的主持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和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签订了双边友好往来、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同时与中正大学中文系签约的还有中文系、哲学系和古籍研究所。预计从本学期开始，汉语史研究中心和中正大学中文系之间就将展开实质性的学术交流活动。

颜洽茂教授访问马来西亚南方学院

2004年3月15—21日，为推动我校与马来西亚高等院校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颜洽茂教授率团访问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英豪多媒体传播学院，受到南方学院院长祝家华博士、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英豪多媒体传播学院谢慧玲教务长盛情接待。在大马期间，颜洽茂教授还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主任杨清

龙教授、英豪多媒体传播学院大众传播系主任林明水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并拜访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官员。

工作动态

汉语史研究中心工作会议在青山湖举行

2004年1月17—18日，我中心在临安青山湖举行了中心工作会议。

本次会议时值学期结束，春节之前，会议的重点是：总结2003年的工作，布置2004年工作，尤其是迎接教育部对中心的检查评估工作。

方一新主任在会上首先传达了人文学院学期工作会上廖可斌常务副院长的报告要点，同时总结了中心2003年的工作情况，对03年底“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布置2004年的工作要点时，方一新主任着重强调了2004年上半年中心迎接教育部检查评估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指出：新学期开始后，中心将以此为工作重点，要求所有专兼职研究人员切实做好各自相关的研究工作，以认真的态度、扎实的工作迎接教育部的检查和评估。会上，方主任还谈到了《汉语史学报》的编辑工作，今年五月将与商务印书馆合办的学术会议，以及中心与台湾中正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方面的情况。

颜洽茂教授、黄笑山教授也在会上作了发言，颜教授介绍了去年12月下旬在台湾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黄教授介绍了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访学的情况及体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心成员还有王云路、祝鸿熹、黄金贵、俞忠鑫、许建平、池昌海、陈东辉、姚永铭、刘锋等老师。

研究生动态

第二届“丁邦新语言学奖”评审会纪要

3月18日，汉语史研究中心召开“丁邦新语言学奖”评审会，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祝鸿熹、黄金贵、黄笑山、俞忠鑫等七位教授出席会议。颜洽茂教授因出访请假。中心办公室刘锋老师列席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修订评奖章程及确定获奖人选。

会议首先对第一届《丁邦新语言学奖评奖章程》进行了讨论，围绕着加强获奖论文质量及方便学生申报的原则，对章程作了几点修正：1、获奖人数，宁缺毋滥。若当年申报论文质量不符要求，允许部分奖项空缺。2、申报评奖时间，不再作限制，中心办公室随时接受研究生申请。3、申报成果的范围为本中心研究生就读期间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学位论文；与导师合作的论文，不在申报范围内。4、硕士、博士分别设奖。5、成果入选与否及获奖等级，以到会评奖委员过半数的投票为准；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

会议接着对申报论文进行评议。方一新主任先对本年度“丁邦新语言学奖”的申报及评审工作作了简要介绍。此次请奖共六位研究生，最后论文送审为五位，其中博士二位：王建莉、宋闻兵；硕士三位：王振挺、陈丽君、凌云志。评审专家二位：祝鸿熹教授、汪少华教授（杭州师范学院），他们负责本次论文的审阅工作，并出具书面意见。之后，祝鸿熹教授作为评审专家代表，对五篇论文作了点评，与此同时，论文

及专家意见在与会的七位教授中进行传阅。最后，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

通过无记名投票，第二届“丁邦新语言学奖”获奖名单产生：博士生宋闻兵获一等奖，博士生王建莉获二等奖。硕士生奖项空缺。

附：

丁邦新语言学奖评奖章程

- 一、本奖金授予在本中心就读的在汉语史研究方面作出成绩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 二、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设立博士生一等奖1人，奖金1500元，二等奖1人，奖金1000元；硕士生一等奖1人，奖金1000元，二等奖1人，奖金500元。每次获奖的名额，可根据情况作适当增减。
- 三、请奖者提交的成果有两类：①当年毕业、答辩的学位论文。②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作者单位明确题署“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研究论文。不含与导师合作署名的论文。
- 四、请奖者须填交申请表，并提交请奖成果——学位论文三份；发表论文原件1份，复印件两份。
- 五、中心对请奖成果先送请校内外同行专家评审，汇总后提交由中心全体教授组成的丁邦新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上讨论。
- 六、中心办公室随时接受申请，三月底以前评出获奖名单，在中心网站及公示栏上公布，并报呈丁邦新先生。

第二届丁邦新语言学奖评选揭晓

经本人申请、校内外专家初评、中心评奖委员会最终评定，第二届（2003年度）

丁邦新语言学奖获奖名单揭晓：

宋闻兵（2000级） 获博士生一等奖；

王建莉（2002级） 获博士生二等奖；

本年度硕士生奖项空缺。

感谢赠书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向本中心赠送其专著《一百年前的苏州话》，在此表示感谢。